

引文格式: 王智杰.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与展开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 (4): 32-44.

#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与展开

王智杰

**摘要:**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面临着规范缺位与实践运行失序的现实困境, 亟须理论指导与制度因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具有全面维护社会公益的价值目标、检察机关妥当参与的职责担当、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与效率价值追求的规范符合性之正当性基础, 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切实履行的必要性需求与客观事实调查、主观量刑激励的可行性支撑, 故此, 理应在规范层面明确肯定调解的适用。与此同时, 为保障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与实施效果, 仍需建立调解过程中的法院主导、检察角色的平等性区分、公告与公开程序的强化监督以及事实保障下的调解前置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调解; 社会公共利益; 效率价值

**作者简介:** 王智杰, 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事案件重复诉讼认定标准实证研究”(18BFX064); 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路径研究”(XDCX2021B036)。

**中图分类号:** D925.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3.04.004

##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调解制度, 基于其所具有的灵活、高效、平等协商等诉讼价值与制度优势, 得以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下简称“社会公益”)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规范亦明确肯定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sup>①</sup>, 并在有效维护与及时修复社会公益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然而, 却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付之阙如。在法律规范层面, 无论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解释》), 抑或2021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规则》), 皆是仅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适用范围以及管辖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sup>②</sup>, 对于具体的程序设计与配套制度则概无涉及, 其中即包括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 在理论研究层面, 亦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有限规制说的论争, 而且也仅仅是作为附属性问题的简要涉及, 未有主题阐述与充分论证, 难以实质

<sup>①</sup>参见:《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sup>②</sup>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二十条,《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十四条、第九十七条。

性解决调解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层面，在法律规范缺位与理论争议未止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基于迫切的需求，已然开始了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试验”<sup>①</sup>，而其中亦不乏指导性案例<sup>[1]</sup>，只是囿于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引发具体操作层面的实践混乱。例如，实务中针对调解协议是否应当公告以及公告的具体内容与程序的问题即存在不一致的认识与做法。故此，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问题，亟须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在理论层面予以统一，以便为实践中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与规范指引。

对此，笔者认为，实有必要针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应：首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其适用的正当性基础为何；其次，在肯定调解适用之正当性的基础之上，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存在适用调解之必要，即调解适用的制度价值为何及其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价值特征是否契合；最后，如何因应实践中调解适用的现实需求与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益之间的价值衡量问题，即兼顾社会公益与诉讼效率之保障，确保调解的适用与规范运行，皆以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作为根本前提与价值目标。本文也将以此作为框架结构，在肯定调解适用的前提下，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问题展开具体的阐述。

## 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正当性基础

学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之正当性的质疑，主要源自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具有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并非案件的当事人而不具有完全处分权的理论观点，进而主张禁止适用调解<sup>[2-3]</sup>；较为缓和的观点则认为上述正当性困境可以通过调解协议的公告与法院的审查予以化解，主张限制调解的适用而并非一概禁止<sup>[4-5]</sup>。对此，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其正当性依据表现为调解适用对于社会公益的全过程保障、检察机关作为调解主体的该当性、制度本质层面的可调解性以及效率价值层面的内在契合，此即足以回应上述质疑。此外，对于协议公告与法院审查程序的设置，与其说是对调解的限制，毋宁认为是对调解适用的保障，因为适用调解的目的即在于及时、充分地维护社会公益，而唯有经过广泛的社会监督与严格的司法审查方可确保这一目的正当实现，得以彰显调解适用的特有价值。

### （一）坚持以社会公益作为核心要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始终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基本原则与根本目标，得以调适社会公益的不可处分性与调解制度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确保调解结果的正当性。

#### 1. 强调社会公益的有效保护的适用前提与目的

调解适用的前提与目的皆在于维护社会公益。一方面，因为调解的对象具有社会性、整体性的社会公益，而并非公益诉讼起诉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之间的个体私益，换言之，调解主体对于调解对象并不具有实体上的权利，恰恰相反，其皆负有保障调解对象的完整性的职责与义务。故此，调解的适用应当以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而不得任由调解主体随意处置。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盛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亦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可以在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参与调解<sup>[1]</sup>。另一方面，调解适用的目

①笔者于2022年9月1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获得裁判文书1148份。其中，2017年12份，2018年143份，2019年295份，2020年441份，2021年209份。

的亦在于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制度优势,为受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因此,调解的适用与社会公益的保护并不冲突,相反,其目的即为及时保护与修复受损的社会公益,并以不得损害社会公益为根本准则。

## 2. 聚焦社会公益的具体修复的调解内容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并非针对社会公益的分割处分,亦非针对因刑事违法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公益受损的责任承担与否的妥协、让步,甚至是利益交易。而是依附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别在刑事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针对刑事违法行为所收集的刑事证据、发现的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案件线索,在查清事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遵循自愿、合法和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益的原则,对公益修复的具体履行方案进行平等协商与灵活处理,以调适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与被告实际履行意愿及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调解的内容方面,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不具有可调性,而实际协商的内容乃是如何确保公益修复的责任履行的质效,即以符合被告履行能力的方案设计,切实保障修复责任的实质履行,避免因超出被告履行能力而导致“空判”,进而对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造成不利影响。在现有的适用调解的案例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即存在通过分期履行、公益劳动抵补、补种林木、增殖放流、增加责任主体等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的责任履行方式,促成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时履行修复责任<sup>①</sup>。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并不等同于实体诉讼请求的全部或部分放弃<sup>[6]</sup>,亦非针对社会公益的“无权处分”,而是在确定损害主体与责任承担的前提下,协商确定修复公共利益的具体方案,为公共利益的有效修复提供保障。

## 3. 严格社会公益的监督审查的结果保障

在当前法律规范中,针对民事公益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所设置的调解协议公告、法院依职权审查以及调解书公开的系列监督审查措施<sup>②</sup>,皆因案件所具有的与私益案件中调解协议的私密性相对应的公益属性而特殊设置,皆以不得损害社会公益作为评价标准。社会公众针对调解内容的广泛监督与人民法院针对社会公益能否完满实现的严格审查,得以切实保障调解适用的法律后果的正当性。因此,同样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明确适用调解的同时,势必需要设置相同的配套保障措施,以规制调解主体针对社会公益的协商行为。

### (二) 检察机关参与调解的主体正当性

#### 1. 维护社会公益的身份担当

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当然且唯一的适格主体,无论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抑或是作为公益代表人的社会身份,皆担负着全面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责与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亦着重指出,人民检察院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的重要力量<sup>[7]</sup>。因此,在真正的权利主体不特定的情况下,鉴于其难以全部参加诉讼并直接做出权利处分,而同时考虑到及时修复社会公益的紧迫性。为了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公众得以进行权利让渡,授权相关主体替代处分,而具有社会公益代

①参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21)鲁1522刑初46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2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20)川0681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书。

②参见:《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表人的身份、承担法律监督项下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责的检察机关实为权利受让的恰当主体，而且，赋予检察机关实体上的处分权，也是保护真正权利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故此，接受权利让渡的检察机关，具有参与调解并做出实体处分的正当性依据。此外，检察机关所负有的维护社会公益的身份担当，亦得以保证其在调解过程中不损害社会公益，得以有力回应学者们对于调解过程中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诸如利益交易的权利滥用<sup>[8-9]</sup>、利己因素的桎梏<sup>[10]</sup>等正当性质疑。因为，社会公益本身即为检察机关的唯一考量标准，保障社会公益的完满性即为检察机关的“利己”行为。

## 2. 作为诉讼原告的权利行使

虽然，现有规范已然明确检察机关在其所直接提起的公益诉讼当中居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法律地位，但是，针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性质与享有的权利类型亦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四条所做出的权威解释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要“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而由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公益诉讼起诉人”这一主体，故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所对应的诉讼主体当是原告。例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sup>[11]</sup>。故此，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得以参与调解，此为其作为诉讼原告的正当权利行使。此外，鉴于权利主体并未亲自参加诉讼，而是由检察机关作为替代主体直接提起诉讼并担负着全部的诉讼义务。因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检察机关理应享有完全的诉讼权利，即包括参与调解的处分权，而实体权利主体的替代亦非完全阻却检察机关诉权行使的充分理由，仅为合理规制的必要因素。

## 3. 规范目的下的处分授权

根据《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而根据《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九条规定，针对检察院的撤诉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撤回起诉属于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程序终结”部分的内容，换言之，现有规范已然附条件准许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行使处分权，即以“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之规范目的的符合为前提。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不仅仅表现为程序性的处分权，而且包含了对实体权利的处分。因为检察机关针对诉讼请求的设置以及是否全部实现的判断，即涉及对社会公益的预期处置。较之于撤回起诉中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前置条件，在调解制度中，以维护社会公益作为适用前提的要求更为严苛，因为当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益时，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sup>①</sup>，而且，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可以超出检察机关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这一适用前提得以保证调解适用的正当性，亦符合规范目的的要求。故此，检察机关获得参与调解的实体处分权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

### （三）诉讼本质层面的规范属性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认定问题，存在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分歧<sup>[12-14]</sup>。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应当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类型，而区别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着诸多差异。一是在受案范围方面，后者限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受到损害”，而无法涵盖为不特定主体所有的社会公益。二是在

<sup>①</sup>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



案件类型方面,前者仅适用于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英雄烈士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而后者则不受此限制。三是在诉讼请求范围方面,后者仅限于物质损害,而前者则得以主张精神损害,如要求赔礼道歉等。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无法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

其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类型。一是在适用案件类型方面,现有规范中皆做出了同一性规定<sup>①</sup>。二是在法律适用依据方面,二者统一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sup>②</sup>。三是从法律规范的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角度予以剖析,在《检察公益诉讼解释》与《检察公益诉讼规则》中<sup>③</sup>,皆将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置于《民事公益诉讼》所属章节之中,并未将其作为单独的诉讼类型而另置,足以表明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规范层面的种属关系。

综上,鉴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而现有规范中已明确认可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故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具有规范层面的正当性。

#### (四) 效率价值层面的制度互洽

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检察公益诉讼解释》所做出的解读中已然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定与构建,其立法用意在于,一并审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sup>[11]</sup>,这与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谋而合,亦反映出最高司法机关对于效率与社会公益之间价值衡量的态度,即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且得以同时兼顾、不可或缺。这也体现出反对调解适用的学者所提出的,“为防止潜在出现的权利滥用导致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宁可牺牲诉讼经济和效率,也不可适用调解程序”<sup>[2]</sup>之主张脱离了立法原意与实践需求,过度关注于调解适用的可能风险并因此对其全盘否定,而忽视了调解适用的制度价值与适用风险的可规制性。

在现有规范中,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风险,所采取的即是风险规制的方案,而非否定制度本身。风险产生的原因即在于附带型民事公益诉讼在法庭调查与审理过程中的独立性难以保障,通常表现为对刑事案件的依附性,但是,这二者又在诉讼目的、主体角色、因果关系判断、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并审理可能导致二者的混同,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则势必进一步压缩民事公益案件的审理空间,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可能对社会公益的完整救济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在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批复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规则》中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应当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切实保障社会组织另行提起单独的民事公益诉讼,为避免影响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而允许检察机关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sup>④</sup>,为保障适格主体的正当诉权以及诉讼程序的流畅性提供了选择空间。与此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刑事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区分与职能划分<sup>⑤</sup>,为刑事案件与民事公益案件的分别进行创造了主体性条件,得以保障附带民事公益案件的独立性。故此,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以避免针对社会公益的不利风险,即可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采取风险规制措施以切实保障社会公益”这一行为模式持赞成的态度。因此,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

①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三条、第二十条,《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七条。

②参见:《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③参见:《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九十七条。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

⑤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五十一至五十七条。

的适用，理应在肯定调解适用的效率价值的同时，设置必要的程序规制以消除适用风险。

### 三、调解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一）调解适用的价值助益

##### 1. 效率需求的助益

调解制度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之制度价值，已然获得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广泛认同，而对于效率的追求亦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需求。其一，为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形势下的效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自2018年正式确立以来，因其在调查取证的便利性、成本效率的实用性、裁判结果的一致性等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6月，检察机关共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5320件，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所占比例高达77.8%<sup>①</sup>，而且其案件数量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sup>②</sup>，已然发展成为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公益的主要手段。故此，在诉讼资源相对有限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的情形下，面对急剧扩张的审理需求，如何提高诉讼效率势必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而明确调解的适用，即可予以化解。其二，为法院管辖特殊规定情形下的效率需求。区别于普通民事公益诉讼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因为刑事案由多为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污染环境罪等较为轻微的普通刑事犯罪<sup>③</sup>，所以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sup>④</sup>，鉴于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而基层法院尤为严重，特殊的管辖规定势必进一步加重基层法院的诉讼负担，亟须简化诉讼程序、优化资源配置，调解制度的适用即可满足上述需求。其三，为社会公益之及时修复下的效率需求。因为社会公益的受损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整体性利益，且过分的迟延可能导致社会公益的不可挽回。因此，针对社会公益的修复具有相当的迫切性，较之于做出判决所需的复杂的诉讼流程以及可能面临的执行难题，便捷、高效的调解制度更为契合。

##### 2. 切实履行的助益

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得以发现，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执行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其一，执行程序的复杂流程。例如，在一起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在被告针对判决赔偿环境损坏数额、专家评估费用提起上诉而被驳回之后，又历经执行立案、不动产拍卖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执行程序<sup>⑤</sup>，耗费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其二，无力履行判决情形下的执行变更。例如，在一起失火罪案件中，判决被告恢复受损林地植被，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调查得知被告无力履行判决，而最终做出“由有关部门提供林木并监督被告分批分次种植”的执行意见<sup>⑥</sup>，而这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中的调解予以协商解决，无需另行判决及执行。其三，无可供执行财产情形下的

①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9/t20210915\\_529543.shtml#2](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9/t20210915_529543.shtml#2)，访问日期：2022年9月1日。

②笔者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检索词在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发现，2018年有裁判文书1124份，2019年有裁判文书2493份，2020年有裁判文书3634份，2021年有裁判文书1852份，检索日期为2022年9月1日。

③关于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参见：《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④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8执复117号执行裁定书。

⑤参见：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2019）甘1125执894号执行裁定书。

实质“空判”。在诸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皆以“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sup>①</sup>,针对社会公益的救济则被迫搁置。而如若适用调解,则可以通过公益劳动等替代性补救措施予以救济。

相较之下,调解制度的适用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公益的修复责任的履行。已有学者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指出,在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通常能够较快履行完毕<sup>[15]</sup>;此外,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参与调解的被告大多数都在案件判决前履行完毕,而且尚未全部履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赔偿金额较大而需分期履行以及需要进行长期的生态恢复<sup>[16]</sup>。上述内容皆反映出,调解主体普遍具有责任履行的主观积极性,而且调解制度在履行方式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与较大的灵活性,得以满足特殊情况下的实际需求。在指导性案例“盛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被告公司在提出调解申请之后,因无力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其控股股东自愿加入诉讼,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供担保,并最终达成了涵盖分期支付赔偿金与替代性修复等内容的调解协议,在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亦避免了企业因重罚而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关闭的不利局面,得以可持续性发展,体现出调解适用对于责任履行效果的有力保障。此外,调解过程中责任主体的增加,实际超出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范围,亦为判决所无法涉及,却处于调解制度的规范射程之内,因为调解内容的开放性,使其得以不局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sup>②</sup>,为全面维护社会公益提供保障。

## (二) 调解适用的基础支撑

### 1. 事实调查的客观保障

调解的启动与实施应当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基本原则<sup>[17]</sup>,以明确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所需承担的责任形式及其限度,避免调解主体对社会公益的不当处置。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无论是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能力,抑或是刑事侦查证据的直接适用,皆可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实调查提供保障,为调解制度的适用奠定可行性基础。首先,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检察机关,自身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能,且可在法庭休庭后进行补充调查<sup>③</sup>;其次,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与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起诉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亦可以在因针对同一违法行为而依附于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即刑事侦查证据的直接适用<sup>④</sup>。故此,充分的事实调查,得以确保调解制度始终运行在维护社会公益的规范轨道之上。

### 2. 量刑激励的主观动力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一并审理刑事、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及时履行得以在刑事案件部分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而调解制度的适用,得以满足先行处置民事责任且以此作为刑事量刑之基础的条件。故此,在适用调解的实践案例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为获得量刑上的优惠,皆主动在刑事判决做出之前对受损的社会公益进行了全部修复,而人民法院亦因此做

①参见: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2021)豫0506执1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1)黔0402执36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21)湘0721执483号执行裁定书等。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

③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五条。

④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八十八条。

出了从轻、减轻处罚的刑事判决，通常表现为“鉴于被告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并已实际承担损害赔偿、行为补救等生态修复责任，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罚”<sup>①</sup>，针对社会公益损害较为轻微、悔罪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被告人，更是做出了判处罚金、适用缓刑的刑事判决<sup>②</sup>。这些案件足以反映出量刑优惠对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调解适用过程中主动履行修复责任的激励效果。相较之下，先刑后民审理模式下所做出的合并判决，对被告人先定罪量刑再通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确定其民事责任，会使被告人产生“打了又赔”的不公平心理<sup>④</sup>，其将在一定程度上抵触甚至拒绝民事责任的承担，而这势必严重影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效果。

#### 四、调解适用的制度保障

综合前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应始终以维护社会公益为基本前提与制度目标，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客观基础，以修复责任履行方案设计为具体内容。因此，得以确立有限调解的基本原则，即调解的范围仅限于责任履行的具体形式，而责任履行与否不得适用调解。例如，在修复型责任中，限于直接修复或替代修复的方式、方法；在赔偿型责任中，限于赔偿的数额与期限，且须以相关的评估鉴定意见为依据；在精神损害责任中，限于认错悔过的形式与范围，且须以受影响公众“可知悉性”为基本标准<sup>①⑧</sup>。此外，为确保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并保证通过调解实现的公共利益保护与通过诉讼判决实现的公共利益保护的内容和程度大致相当<sup>⑥</sup>，仍需针对调解过程中相关主体的参与形式与角色分工予以明确并强化。例如，人民法院对于调解适用的积极主导与严格审查，人民检察院作为刑事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区分及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社会公众对于调解适用的积极参与以及针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广泛监督，唯有如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方可始终保持维护社会公益的制度本色。

##### （一）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法院主导

在私益诉讼中，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需要，其诉讼模式已然强调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逐步强化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与诉讼过程中的当事人主导，而削弱法官的作用，其通常居于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地位。然而，鉴于公共利益的牵连性与社会性，为克服调解适用过程中的主体能力差异问题，避免因主体排斥心理而造成程序拖延以及针对社会公益的不当处置，应当由人民法院引导调解进程，以保障调解过程的顺畅，并对调解主体的协商行为与结果进行实质审查，以确保调解适用的正当性与公益性。故此，笔者认为，基于职权主义非讼法理的正当程序理念，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诉讼效率为指引，通过适当限制当事人权利以实现诉讼价值<sup>①⑨</sup>，应当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确立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由法院主导调解过程并实施结果监督。针对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司法控制问题，现有规范中已有涉及，针对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益的依职权释明<sup>③</sup>以及针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查与调解书的公开<sup>④</sup>，即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处

①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刑终66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2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20）内0622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书等。

②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21）闽0112刑初92号刑事判决书、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苏8601刑初173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等。

③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分实体权益的控制与调解适用之程序性事项的控制。此外,为了适当提高主体的调解意愿、保障主体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增加“准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规定。

囿于主动申请调解往往被视为示弱的表现,导致当事人对于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产生排斥的心理,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讼权时,认为判决更具有正当性而针对调解则存在着利益交易的顾虑,心理上或者观念上的排斥使调解方式更加难以运用<sup>[16]</sup>,实践数据亦表明,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较之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所提起的案件,判决率极高、调解率极低<sup>[20]</sup>。因此,较之于申请调解中对于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则旨在消除公益对抗中当事人对调解的本能排斥,而且从最终的实施效果来看,初始持排斥心态的当事人,在进入调解程序后,亦能够积极参与,与自愿调解相比,成功的比例相差无几<sup>[21]</sup>。在具体实施方面,鉴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与诉讼地位的差异,为促成一致意见的顺利达成、确保协商过程中的实质平等,可以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调解方案,并对方案设计的具体法律依据做出说明,针对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予以解释与协调,引导当事人达成最终的共识。人民法院针对调解适用的全程主导,有利于实现调解过程的效率与规范,亦得以保障调解结果的正当性。当然,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依然应当遵循调解自愿原则。当事人提出明确异议则得以排除调解的适用,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亦应当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人民法院所提供的调解方案则仅是作为参考,而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

## (二) 平等协商原则下的检察角色区分

鉴于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分别承担着刑事公诉人、公益诉讼起诉人以及法律监督机关的诉讼职能,与此同时,作为同一主体的刑事被告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部分所处的诉讼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亦不相同,故此,理应对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划分予以明确,避免因角色混同而引发职能错位,形成检察机关针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诉讼能力方面的“压迫性”优势,进而破坏调解协商的平等性环境。

检察角色区分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主体区分、职能区分与职责并列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支持起诉的主体区分。实践中存在将人民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的主体,同时作为支持公诉与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表述为“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在出庭人员方面,检察机关指派出庭支持起诉的检察员亦为同一人<sup>①</sup>,鉴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所涉及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且关乎社会公众的整体性利益,如此形式化的主体区分而表现为实质上的混同,不仅可能影响社会公益的救济效果,掺杂公诉人属性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亦不符合调解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定位。故此,笔者认为,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明确由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分别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保证公益救济的专业性与公益诉讼起诉人参与调解的平等主体之属性。其次,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职能区分。代表国家行使追诉职能的公诉人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诉讼地位自是不平等的,但是,作为调解主体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之间理应在诉讼地位与权利义务方面保持一致性,针对调解主体之间诉讼能力方面的差异仍需予以平衡,以实现调解适用的实质平等。故此,应当防止检察公诉职能对调解适用的“渗透”,公益诉讼起诉人在参与调解的过程中,应当始终秉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以公诉人的身份

①参见: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20)川0681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书,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苏8601刑初173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21)闽0112刑初92号刑事判决书。

讯问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亦不得以归属于公诉职能的定罪量刑问题作为促成调解的谈判筹码，从而产生一定的“胁迫”性，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并予以禁止。最后，支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并列。现有规范在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时，将“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与“法律监督”职权相并列<sup>①</sup>，故此，笔者认为，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过程中，检察机关仅为诉讼当事人的角色，不得以法律监督机关而“凌驾”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之上，进而达成“压迫性”调解协议。与此同时，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应当在调解协议达成之后，针对协议内容是否符合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以及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督，实践中也已经存在通过检察机关督促执行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案例<sup>②</sup>。

### （三）权利让渡条件下的社会监督

正如前文所述，调解主体获得真正权利主体的授权，应当以实现社会公众针对调解过程与结果的广泛监督为前提，现有规范中亦规定了涉及公共利益的调解协议的公告与调解书的公开制度，以畅通社会公众的监督途径。然而，实践运行效果却极不乐观。第一，调解书的公开数量极少，在裁判文书网中仅检索到 74 份<sup>③</sup>，甚至存在以“调解方式结案”为由，对于调解书的内容不予公开的情形<sup>④</sup>；第二，调解协议的内容单一，多数调解协议的内容仅限于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增殖放流、补种林木、赔礼道歉等行为责任的履行<sup>⑤</sup>，在刑事判决书中，更是仅将调解书作为证据提供而未有涉及具体内容<sup>⑥</sup>；第三，调解协议的公告方式较为混乱，即便是在公开的调解书中，亦存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当地法院官方网站、当地法院公告栏、大洋网等诸多公告形式<sup>⑦</sup>，甚至还存在“已依法公告”的模糊性表述<sup>⑧</sup>及以“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益”为由，人民法院予以直接确认，而未有公告<sup>⑨</sup>。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在公告的内容方面，应当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与调解协议一并公告。具体应当包含损害行为与事实证据、关于损害严重程度的鉴定意见、公益修复措施与费用的评估意见等内容，此即调解协议得以达成的基础与依据。这些内容的公开，使社会公众得以判断调解协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次，在

①参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

②参见：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20）川 0681 刑初 300 号刑事判决书。

③同一时间，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检索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获得判决书 8653 份，裁定书 671 份，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1 日。

④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21）闽 0112 刑初 92 号刑事调解书。

⑤参见：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苏 8601 刑初 173 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8）苏 1202 刑初 402 号刑事判决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1）沪 7101 刑初 203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⑥参见：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2019）皖 0711 刑初 24 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20）内 0622 刑初 163 号刑事判决书。

⑦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1）沪 7101 刑初 46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4 刑终 430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7 刑初 249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⑧参见：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21）鄂 0682 刑初 14 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20）苏 1302 刑初 61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2018）赣 0981 刑初 323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⑨参见：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2021）赣 0426 刑初 47 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1）赣 0731 刑初 18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 0902 刑初 430-1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公告的方式方面,应当确定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统一发布平台,便于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例如,针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前公告程序,即得以统一通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进行。相较之下,人民法院系统则存在着更加专业的网络平台,即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主办的“人民法院公告网”,并在网站中开设了“公益诉讼案件公告”专栏。故此,笔者认为,得以明确将“人民法院公告网”作为调解协议公告的唯一平台,避免因公告方式的混乱而影响社会公众的监督效果。对此,通过分析已公开的调解书得以发现,上海地区法院即是将调解协议统一经由人民法院公告网进行公告<sup>①</sup>。与此同时,鉴于诉讼案件的区域性,为了提高区域内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得以在法院辖区内辅以“多平台同时发布”的公告方式,即在案件辖区的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案件辖区的主流媒体等平台上同时公告<sup>[22]</sup>。最后,在调解书的公开方面,应当单独制作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而非依附于刑事判决的内容之中,以裁判文书网为依托,积极推动调解书的公开上网,唯有完全透明地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方可彻底消除针对调解适用的质疑与顾虑,确保调解过程与结果的正当性。

#### (四) 事实保障前提下的调解前置

私益诉讼中调解的启动时间,现有规范并未做出任何限制。但是,鉴于公益诉讼案件在诉讼主体与诉讼客体方面的特殊性,为避免因调解程序的滥用而损害社会公益,理应对调解的启动时间进行合理规制。在针对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中,一致认为公益诉讼中调解的启动应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故而皆主张在当事人双方经过举证、质证之后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方可启动调解程序,以避免不当妥协甚至牺牲社会公益的情形<sup>[23-24]</sup>。对此,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得以在切实维护社会公益的同时,支持调解适用的前置。第一,如前所述,鉴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调查取证的能力,故得以保证检察机关起诉时,针对案件所进行的事实调查程度符合上述主张的调解启动的事实要求,而且实践中已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以破解公益诉讼调查取证难题的有力尝试<sup>②</sup>,此即助力调查取证的有效手段;第二,鉴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多为轻微刑事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且从实践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来看,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要求公益修复所实施的增殖放流、补种林木的数量皆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案情简单、事实调查便利、事实争议较小、责任负担较轻的案件特征。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能够在事实调查清楚以明确责任承担、当事人之间并无争议以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予以前置,以实现公益修复责任的尽快履行,避免损害后果的进一步加剧,亦得以简化诉讼程序、节约诉讼资源。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前置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的庭前调解与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的先行调解。首先,庭前调解即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开庭审理之前,基于检察机关所提交的公益诉讼起诉书中的事实证据内容,组织公益诉讼起诉人与附带民

①参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刑初1849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刑初450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刑初570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诉邱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0/t20211009\\_531433.shtml#1](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0/t20211009_531433.shtml#1),访问日期:2022年9月1日。

事公益诉讼被告就民事责任部分进行协商。在适用条件方面，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径行调解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sup>①</sup>，人民法院得以依职权启动庭前调解。若达成调解协议，即可直接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亦可与刑事案件部分的审理期限相契合，最后一并做出刑事判决书与民事调解书，得以有效避免诉讼拖延。其次，诉讼过程中的先行调解，即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遵循“定罪—民事调解—量刑”的审理模式。在基于公诉人提交的刑事证据针对刑事犯罪做出认定之后、最终做出刑罚之前，基于公益诉讼起诉人所提交的，证明社会公益受损程度及其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实施的不法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针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先行调解，并将责任履行的态度与实际进度作为后续量刑的参考因素，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人做出从轻、减轻的处罚。实践中已然存在此种积极尝试，即将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其认罪悔罪表现，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公益损害修复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价值互补<sup>②</sup>。当然，为最大限度地摆脱“以钱赎刑”的桎梏，应当针对量刑区间的幅度设置明确的适用标准，根据实际履行的进度，对已全部履行完毕与部分履行、尚未履行的情形所做出的从轻量刑的幅度应当予以梯度化区分。此外，亦可根据实际修复的效果，分别设置从轻量刑的幅度。如此，方可减轻“同罪不同罚”对于司法公正的冲击。

## 五、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具有高效维护社会公益、处分目的之规范符合性的正当性价值，满足司法实践的效率需求的同时，亦有检察机关的事实证据支撑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保障。故此，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理应增加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法律条款，为实践运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在程序安排方面仍需细化以提高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通过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事实要件、构建当事人异议提出机制与诉调衔接机制、设计法院主导下沟通与协调程序以及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等有力手段，切实保障调解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规范运行与有效落实，助力于全面维护社会公益之理想愿景的实现。

### 参考文献：

- [1]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 [N]. 检察日报, 2020-12-15 (2).
- [2] 高星阁.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实现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1 (3): 91-101.
- [3] 胡巧绒, 舒平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运行实证观察 [J]. 犯罪研究, 2020 (3): 88-105.
- [4] 叶榭平, 常霄.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模式选择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9 (6): 13-22.
- [5] 谢小剑.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创新与实践突围：以 207 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9 (5): 92-111.
- [6] 张旭勇, 潘幕元. 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协议公告审查制度及其完善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 34 (4): 11-19.
- [7]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1-08-03 (1).
- [8] 张卫平. 民事纠纷的社会性与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的构建 [J]. 学习与探索, 2020 (8): 67-79.

<sup>①</sup>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sup>②</sup>《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0/t20211009\\_531433.shtml#1](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0/t20211009_531433.shtml#1)，访问日期：2022 年 9 月 1 日。



- [9] 张卫平. 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 [J]. 清华法学, 2013, 7 (4): 6-23.
- [10] 张锋.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法律制度建构 [J]. 政法论丛, 2015 (1): 120-128.
- [11] 江必新. 认真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 全面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审判工作 [N]. 人民法院报, 2018-03-05 (3).
- [12] 苏和生, 沈定成.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厘清、功能定位与障碍消除 [J]. 学术探索, 2020 (9): 74-83.
- [13] 张嘉军.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 36 (3): 92-110.
- [14] 姜保忠, 姜新平.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基于 150 份法院裁判文书的分析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 34 (2): 79-87.
- [15] 韩静茹. 公益诉讼领域民事检察权的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J]. 当代法学, 2020, 34 (1): 128-138.
- [16] 袁紫燕.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研究 [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20.
- [17] 曲昇霞.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之适用 [J]. 政法论丛, 2016 (3): 154-160.
- [18] 吴勇, 王聪.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辨析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2 (2): 45-51.
- [19] 石春雷. 职权主义非讼法理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23 (2): 50-58.
- [20] 陈伟宏.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结案方式实证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 [21] 唐力. 在“强制”和“合意”之间: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J]. 现代法学, 2012, 34 (3): 86-96.
- [22] 熊超, 李玉蓉. 调解机制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利弊分析及完善建议: 以“毒跑道”公益诉讼案为例 [J]. 环境保护, 2021, 49 (9): 64-66.
- [23] 唐守东.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现实考察与发展完善 [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0 (6): 40-45.
- [24] 孙洪坤, 张姣.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3 (9): 100-104.

##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tion in Public Interest Penal Litigation with Civil Incidental

Wang Zhijie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in public interest penal litigation with civil incidental is faced with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absence of norms and the disorder of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is in urgent need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ystem respons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diation system in public interest penal litigation with civil incidental has the value obj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ing social public interest, the duty of procuratorial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properly,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legitimate basis for the conformity of the norms of efficiency value pursuit, which has the necessit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support of objective fact investigation and subjective sentencing incentive,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should be clearly affirmed at the normative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mediation system,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lish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court leadership in the mediation process, equal distinction of procuratorial roles,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of public announcement and procedure disclosure and pre-mediation under the guarantee of facts.

**Keywords:** public interest penal litigation with civil incidental; mediation; social public interest; efficiency value

(收稿日期: 2022-09-29; 责任编辑: 晏小敏)